

評戴逸《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

姚 薇 元

戴逸同志編著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九月間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九月第三次印刷。這是一本試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和闡述中國近代歷史的專著。作者結合自己研究心得和教學經驗並吸取了國內歷史科學研究的成果，對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帶有關鍵性的問題，如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失敗的基本原因，楊韋事變的原因和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等都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內容取材比較豐富，而文字表述的流暢生動，引人入勝，更是本書突出的優點。

但另一方面，本書除具有上述許多優點之外，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和史料的選擇運用方面，也還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就個人所想到的一些粗淺的意見，提供給本書的作者和讀者參考。

一

馬克思主義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根本看法在毛主席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里早經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①這裡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中國近代階級鬥爭的基本特徵，它象一條紅綫一樣貫串着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行程；因此，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首要任務就在於闡明中國人民怎樣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勢力的英勇鬥爭的過程，以及這些鬥爭的發展規律和它的歷史意義。根據這個尺度來衡量本書的內容，我們認為，作者雖然已經抓住了這個基本綫索，但還貫串得不够充分，闡述得不够明確。

首先，作者對中國人民在鴉片戰爭中的英勇鬥爭的事跡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書關於廣東三元里人民的反英鬥爭，雖然有了一定篇幅的敘述，但對這次反侵略鬥爭的偉大意義和作用，缺乏深入的分析 and 說明。此外，對廣東人民反對鴉片貿易和他們在林則徐領導下的反對鴉片貿易的鬥爭，以及沿海沿江如廈門、松江、瓜州等地人民的反抗侵略軍的英勇鬥爭，都一字未提。在敘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雖然表述了廣東人民的反英事跡，但對天津和大沽口等地人民反抗英法侵略軍的鬥爭却都沒有提到。

相反地，作者把重點放在描寫清朝將領的行動上，如奕山、奕經的“腐朽頹廢”（見本書第91、101頁），余步云的“貪生怕死”（見本書第99頁），海齡的“愚昧頑固”（見本書第106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一版，第601—602頁。

和叶名琛的“閉塞无知”（見本書第314頁）等，都繪形繪聲，詳加描述。作者的用意，可能是为了揭露清朝封建統治集团的丑惡面貌，本亦无可厚非；但由于作者对于人民的抗敌斗争的事跡表述得不够全面，相形之下，很容易使讀者产生一种輕重倒置，喧宾夺主的感觉。

特別显著的，作者对反革命头子、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人的身世和經歷，詳加敘述，占用很大的篇幅^①。相反的，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領袖人物，除洪秀全外，所有楊秀清、馮云山、肖朝貴、石达开、韋昌輝、秦日昌、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人的身世和革命前的經歷，大都用一两句話帶过。

同时，对反革命地主武装的湘軍，专列“湘軍的兴起及其出省作战”一目，用五十八行的篇幅詳加論述（見本書第269—271頁），相反的，对太平軍的組織形式的敘述，却只占七行（見本書第161頁），仅及前者八分之一左右。这种詳略悬殊，輕重倒置的敘述，說明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是不够恰当的。

正因为这样，作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战斗过程，虽然有了較多篇幅的敘述，但在某些地方还帶有不少苛責农民起义軍的口脛。例如，作者在論述太平軍的北伐援軍时，根据《粵匪南北滋扰紀略》的記載，說北伐援軍“在攻临清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站在旁边觀望”，“攻破临清之后，在旁边觀望的人却出来大肆搶掠”，“从表面上看是浩浩蕩蕩，实际上是未受訓練的烏合之众。”（見本書第247頁）

按《粵匪南北滋扰紀略》一書是清朝浙江省余杭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姚宪之根据官方誣蔑太平軍的邸報編輯的，史料的实际价值很低。作者这样不加批判地征引过来，就等于接受了敌人的反动宣傳。这种选择和运用史料的态度是值得考虑的。

又如在論述太平軍的安庆保卫战时，作者用譴責的口脛說：“安庆城的难以保全，已經是洞若觀火的了”，“但是陈玉成却凭着血气之勇”，“硬拚硬战”，“妄想支持不可挽救的安庆圍城。这不能不說是一个严重的錯誤”。（見本書第331頁）

在論述天京失陷时，作者又用同样的口脛說，放棄天京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指責太平軍“既无回旋之地，又无裹腹之粮，士气极为低沉，想用这些軍隊来抵擋中外反革命軍隊的进攻，其結果只能使革命遭到复灭”，“再一次犯了战略上的錯誤”。（見本書第503、507頁）

这些提法都是不够恰当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它是运用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历史地看待具体的問題；如果脱离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条件，不从实际出发，那末，所有一切的分析和評論都会变成了无的放矢的空話。历史証明：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如作者自己在結論中所說，太平天国革命还仅仅是个农民革命，当时中国的工人階級还没有产生，单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的。（見本書第519頁）那么，即使他們在革命过程中果真犯了什么“凭着血气之勇，硬拚硬战”，和“士气极为低沉”等錯誤，也只是导致失敗的次要的、派生的原因罢了；我們是不可以用譴責的口脛，苛求于前人的。何况作者所指責的那些錯誤的史料根据还是很不可靠的呢？

总之，作者在闡述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事蹟时，不但沒有刻画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頑强的反抗精神。”^②而且有时在字里行間还透露了作者对

① 見本書（即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269頁，第486頁和第495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602頁。

于人民革命斗争的英勇事迹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态度。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严重的缺点。

二

作者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本书优点之一。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作者提出的某些论点也还有待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例如：

(1) 作者对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估计过高，从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和性质问题的看法也不够恰当。作者认为在鸦片战前，“当时在丝织、陶瓷、煮盐、采铁冶铁，采铜冶铜、伐木、造纸、制糖等行业中已经有或大或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见本书第23页）“按其发展阶段来说，则是大机器工业以前的一种工业生产形态。”（见本书第32页）并且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的发展，总是无情地，无例外地打通自己的道路”的话来论证“行将到来的革命一定要发挥出震撼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见本书第40页）

显然，这里所说的“行将到来的革命”是指太平天国革命而言。我们试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是否已经达到了象恩格斯所说的要无情地“打通自己的道路”的发展阶段呢？

根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原文，恩格斯在作者所引的那句话的下一半明明写道：“这方面最近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所已经说过的法国大革命。”①可见恩格斯所说的“经济的发展”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为论据的。那末，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了象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那样程度呢？刘大年同志说得好：“不管如何夸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太平天国时代决没有可以和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的社会条件。”②

这里看出：作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是摘引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的片断词句，来为自己的论点服务。

为了证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情况，作者旁征博引了许多“手工工场”的材料。我们姑且不问作者是否把不完全是商品生产的苏杭丝织业当作完全商品生产；把农奴式劳动的云南铜矿业当作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把农村付业的松江棉纺织业当作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③仅就作者自己所说，这些“手工工场和当时并存的大量的农村付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小作坊比较起来，不过“象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而已。（见本书第35页）

显然，这样一点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还远远不能成为突破封建制度的独立的力量。那末，作者这里已经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在上文所提出的论点了。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反映了作者对鸦片战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太平天国运动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作者只征引了上一半。

②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10期。

③ 参阅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四期。本文不再赘述。

的社会内容認識是不够明确的。

正因为这样，作者一方面指責“个别历史工作者”“对于手工业工人在太平天国中的作用过分地加以誇大，看来太平天国革命似乎有点象无产階級萌芽份子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了。”（見本書第514頁）另一方面却依然強調所謂“无产階級萌芽分子”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把参加拜上帝会的紫荆山“燒炭工人”和龙山“銀矿工人”都当作資本主义性質的作坊或手工工場的手工业工人，把拜上帝会的領袖楊秀清、肖朝貴和李秀成等都算作手工业工人，从而認為“手工业工人在拜上帝会中占着很大的数量和重要的地位”，（見本書第162頁）他們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骨干和核心。”（見本書第163頁）并且強調說：“在太平天国革命前期，无产階級萌芽分子曾經对革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見本書第514頁）

作者这种說法，和他所指責的“个别历史工作者”的論調，在实际上是一致的。其实，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成員，李秀成自述里早經明白地說过：“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結成聚众。”作者也曾征引了李秀成的这句话來說明“拜上帝会的基本羣众是农民。”（本書第162頁）但在下文却又強調所謂“燒炭工人”和“銀矿工人”的数量和地位。

关于紫荆山的“燒炭工人”，据《金田之遊及其他》一書的作者实地調查的結果，只不过是“散居小村落各自謀生的工人，殊非有組織的大工厂之成羣結队的僱工耳”^①。在李秀成自述里也明明說楊秀清“在家种山燒炭为业”，肖朝貴和李秀成本人都是“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可見他們都是在殘酷的封建地租剝削下，不得不兼做燒炭付业的貧苦农民，并不是什么“燒炭工人”，更不是資本主义手工工場里的工資劳动者，当然說不上是什么“无产階級萌芽分子”了。

至于所謂“龙山銀矿工人”，作者所根据的史料是广西貴县的“稟清撫宪批示封禁开矿碑記”。按这块石碑現存广西貴县保健院，是貴县的地主豪紳們在清光緒十三年（1889年）才刻立的^②，碑中所載貴县龙山矿工在永安州参加太平軍的事，在李秀成自述及其他太平天国的文獻中都沒有提到，在圍攻永安的清軍將領烏兰泰、向荣等人的奏稿里也不見隻字。难道这样一件重大的事，而当时的双方当事人都沒有注意到，反而在三十年以后的貴县地主們却確知其事嗎？可見这事縱然不是他們凭空捏造出来的，也很可能是他們故意誇張，危言聳听，以期达到霸占山地，封禁开矿的目的。退一步說，即使碑文所載，确系事实；但当时所謂“矿徒”，分明是居住在“深山穷谷”的“遊民”，充其量也不过是萌芽的农村无产階級分子，这与恩格斯所說的在城市里的“近代資產階級社会之萌芽的无产階級分子”^③的概念，也是不相符合的。

既然所謂“燒炭工人”和“龙山矿工”都不是无产階級萌芽分子，那末，作者所說他們对太平天国运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話，也就等于无稽之談了。

由此可見，在鴉片战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資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胎里的微弱的新的社会形态的萌芽，还远远沒有达到足以破坏封建制度，建立資本主义制度的独立力量；鴉片战后，由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拦住了它

① 見簡义文：《金田之遊及其他》商务印書館1946年版，第26頁。

② 見《太平天国起义調查报告》三联書店1956年版，第107—108頁。

③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49年华中新华書店版，第14頁。

的前進道路。中國社會經濟情況直到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一年，一八五二年，仍然是象米淇爾報告書中所描寫的那樣“男耕女織”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牢固地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①顯然，太平天國起義之所以爆發，並不是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而“無情地打通自己的道路”的結果，而是由於鴉片戰後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太平天國是“停滯的社會生活之產物”。^②

這樣，太平天國起義無疑地是一個單純的農民戰爭，而不是什麼“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還是這次農民戰爭以後的事情。^③

由於作者對太平天國革命的社會內容的認識不夠明確，因而在分析太平天國革命性質時就不能不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太平天國革命既是一個農民戰爭，又是一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見本書第514頁）

（2）作者在敘述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動時，強調基督教對洪秀全的影響。詳細述說洪秀全怎樣在廣州獲得宣傳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勸世良言”，怎樣在閱讀這本小冊子後，被“基督教義中的平等觀念吸住了”，因而這本“為侵略者服務的宗教小冊子在洪秀全手里卻變成了革命的觸媒劑”，“利用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來反對封建的等級制度。”這是因為“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存在着森嚴的等級制度，勞動人民接觸到資產階級的‘平等’思想，那就會激發起他們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情緒。”就在這種認識下，作者把洪秀全所寫的闡發革命理論的三篇創作，叫做“宗教作品”。（見本書第150—154頁）

作者這樣過分地誇大基督教對太平天國運動的作用，並且把農民要求“平等”的思想，說成從基督教義中吸收過來的。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在“中國事件”一文中早經指出：太平天國運動“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但這是東方各種運動所共有的特點。引起風潮的直接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因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時國家制度之震動，銀子外溢，因外貨輸入所引起的經濟平衡之破壞以及其他等等”^④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民起義乃是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地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太平天國起義之所以爆發正是鴉片戰後農民和地主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結果。這次起義誠然帶著上帝教的面具，但宗教面具不過是用來號召和組織農民參加鬥爭的旗幟而已。太平天國的“平等思想”乃是農民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下，要求平分土地的思想。正如列寧所指出：“‘平分土地’的思想，不過是表現着農民力求‘平等’而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完全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那種革命願望而已。”^⑤洪秀全所理想的“太平天國”，就是一個“絕對平均的人間天堂”。它集中表達了千百年來我國億萬農民的崇高願望。毛主席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⑥可見這種思想不是從基督教的教義中吸收過來的。勞動人民革命情緒的高漲，是由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決不是由於“接觸到資產階級的‘平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129頁。

② 前書第140頁。

③ 參看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④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頁。

⑤ 《列寧文選》第一卷，第787頁，參看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幾個問題》一文。

⑥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1年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95頁。

等’思想”的緣故。作者抽掉了階級內容來談抽象的“平等思想”，就不能不陷入主觀主義的迷陣，從而對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導思想作了脫離實際的解釋。

三

本書作者用五百二十二頁的巨帙論述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一段歷史，在“編寫時，曾經參考了社會上公開發行的各種著作、論文和資料集”，（見本書末尾的“後記”），取材比較廣泛，內容比較豐富，這是本書優點之一，但是，本書的主要缺點，也正表現作者對於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方面。

（1）首先，作者處理史料的態度是不够嚴肅認真的。有時不考慮史料的時間性，隨手拈取一些史料，來論證自己提出的論點。例如，本書第36頁，作者征引清朝康熙年間周建鼎等編的松江府志的材料和1852年的廣州英國代辦米淇爾給香港總督文翰的報告書，作為說明“中國大多數農戶又耕又織，辛勤地從事農村付業生產和小商品生產的情況。”的論證。這裡，作者把相隔二百年的兩件史料湊合在一起來為自己的論點服務。這樣征引鴉片戰前一百幾十年和鴉片戰後十年的史料來說明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社會經濟背景，顯然是違反了歷史主義的基本原則。

（2）其次，由於作者處理史料的態度不够認真，有時征引一段史料論證問題，而恰巧把其中最關緊要的，最能夠說明問題的部分漏掉了，從而使所得結論變成了憑空臆斷的空話。例如本書第73頁，作者征引林則徐的“錢票無甚關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說明當時禁烟派獲得勝利的原因，這是正確的。但在征引時却漏掉其中最關緊要的一段話：“迨流毒天下，則為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這是最能打中道光皇帝的心弦的話，使他認識到如果不立刻嚴禁鴉片，將來兵源和餉源都要發生問題。他考慮到鴉片貿易將要危害他的統治時，才採納林則徐的禁烟主張，從而“爭辯的結果，禁烟派得到了勝利”。作者只征引了林則徐申論嚴禁吸煙的理由，而把上述幾句話漏掉了，這樣，使下文所說：“由於鴉片的利益和封建統治利益相抵觸，清政府要按照原來樣式統治下去，便不能不採取嚴禁鴉片的措施”的論斷變成了無根的臆說了。

（3）有時作者似乎還沒有掌握一定的史料，摸不清歷史現象的內在聯系，單憑主觀猜測，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例如第14頁，作者在敘述英國侵略軍進犯長江時寫道：“侵略軍為了集中兵力攻打清朝財富之區，于六月間進犯長江。”

按英國侵略軍的進犯長江乃是實行英政府早經決定的切斷中國內陸交通的毒辣戰略。早在一年以前，義律就向印度總督奧克蘭獻策“控制運河和揚子江的交叉點”，①1841年九月底英政府指使印度政府調集海陸軍，準備“割斷中華帝國主要內陸交通綫的一個據點，並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一個‘令人滿意’的條約”。②侵略者的這種毒辣戰略，果然達到了它所預料的結果，當英艦侵犯鎮江，封鎖瓜州口時，投降派耆英、伊里布等就慌慌失措地向清政府報告，

① 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744頁。

② 見前書，第一冊，第331頁。

“文報往來隔絕，糧餉轉運維艱”的情況，懇求“暫事羈縻”^①了。作者所說，“侵略軍為了攻打清朝財富之區”而進犯長江，只是“想當然耳”的說法罷了。

又如第113頁，作者分析南京條約的內容時寫道：“南京條約中並沒有提到戰爭起因的鴉片問題，這在清政府是不敢再提這個辣（棘）手的問題，在英政府是故意迴避這個可恥的問題。”

按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到鴉片問題，這在清政府方面確是“不敢再提這個辣（棘）手的問題”；但說“在英政府是故意迴避這個可恥的問題。却非事實。”據當時參與和議的一個軍官利洛所寫《締約日記》的記載，英國侵略軍頭目“亨利爵士”（按即璞鼎查）不但沒有承認販賣鴉片是一個可恥的問題，而“故意迴避”，相反的，却無恥地提出了公開販賣鴉片的主張，并誣蔑中國人民欠缺道德品質，無法禁絕鴉片，只有“將鴉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下便人民，上裕國課”。當時中國代表“都一致不愿再談這個問題”，并“表示大皇帝不會听从這種議論”，因而作罷。^②

又據袁陶愚的《壬寅聞見紀略》的記載，在江寧談判的過程中，英國侵略者曾在七月初七日表示“烟土一節，亦須作為官物，嗣後愿加重納稅。”^③後來在十一日又表示要“上表請開烟禁”，當時清代表“黃恩彤與咸齡答以烟土一節，姑俟再商而罷。”^④但是，侵略者的這種奢望並沒有放棄，後來在1854年的修約交涉時，英使包令又正式提出了“將鴉片土一項，准其一律進口，報稅公允”^⑤。終於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達到了他們的貪慾。^⑥

根據中英兩方的史料，證明在南京條約談判的過程中，英國侵略者確曾提出過“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無恥要求。作者所說“英政府故意迴避這個可恥的問題”，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

（4）作者對史料的準確性和可靠程度似乎不大考慮，從而本書有關年代和數字的記述存在着不少的錯誤。有時似乎也感到不大可靠，試圖含糊帶過。例如第77頁寫道：“（林則徐）迫使他們（按指義律和顧地等英國鴉片販子）交出了所藏的二萬另二百八十三箱鴉片，另有二千余麻袋，共重二百數十萬斤，（其中有美商的鴉片一千多箱。）”據林則徐使粵奏稿的記載，“前後所收夷人鴉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義律原稟應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數，更溢收一千袋有零。”^⑦除暫留八箱作為以後檢查样品而外，悉數銷化，“共有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除去箱袋，實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⑧作者所記箱數和重量全誤。又美商所繳鴉片共一千五百四十箱，見信及錄第39頁。作者只含糊說“一千多箱，又未註明出處。

① 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五十五，第23頁。

② 見《鴉片戰爭資料》第五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514—515頁。

③ 見前書，第三冊，第109頁。

④ 見前書，第三冊，第111頁。

⑤ 見《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九卷，第四十二頁。

⑥ 《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五款規定，“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見《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17頁）

⑦ 見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使粵奏稿》卷二，第十頁。

⑧ 見前書，卷三，第十七至十八頁。

又如第125頁写道：“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十九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繼开埠。”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浙江提督李廷玉奏折，宁波开市实在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1844年元旦日^①，又同書卷七十二閩浙总督刘韵珂等奏，福州开埠实在1844年七月三日^②作者所說宁波和福州的开埠年月，不知何据，抑或是換算公元时弄錯，也未可知。

又如作者敘述清初海關进口稅写道：“进口貨物的正稅（包括船鈔、貨餉）虽然很輕，約为值百抽二。”（見本書第61頁），按清初海關进口稅分船鈔和貨餉两种。船鈔是按貨船的容积大小征收，“凡一等大船，征鈔自一千一百余两至二千一二百两不等，二三等中小船，征鈔八百余两至四百余两不等”。^③貨餉是按貨物的精粗和时价的高低征收，“凡商船出洋进口貨物，按斤科稅者多，有按丈正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別貴賤征收。”^④据萊特著中国關稅沿革史，康熙年間的海關进口貨稅率是百分之四^⑤，作者把船鈔和貨餉混为一談，并說“約为值百抽二”，不知道船鈔是按船的容积大小抽稅而不是計值抽稅。

四

作者在本書末尾的“后記”里說明他在“編写时曾参考了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各种著作論文和資料集。”这样儘量吸取国内历史科学研究成果，使本書科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正因为如此，本書所引史料不少是从別人的著作中轉引来的，而且由于作者在轉引时，沒有仔細校核原書或原始文献，因而反映在本書的注脚里存在不少缺点：

（1）只註篇名，不註出处。

例如本書第61頁註①“各關規礼名色請刪改載于則例折。”这个奏折究竟到哪儿去找呢？这样的註脚，有等于无，对于讀者是毫无用处的。其实这个奏折見于“史料旬刊”第五期第159—161頁，为什么不註明呢？

又如第15頁註⑦“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作者在正文里引用了这篇論文關於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全国土地集中情况的估算，并且肯定說，“这个估算大体上是近似的。”可見王瑛的估算是有一定的論証和数据的。为了便于讀者查对那些論証和数据，應該註明它的出处：“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隔几頁就可找到一两条，甚至在一頁里有几条。例如第27頁的註②和註③，第71頁的註①，註③和註④等都沒有註明出处。

（2）只註書名，不註卷頁例。

这类的例子更多，有时在一頁上有三四条。例如第19頁的註①到註⑤，第106頁的註①到註④，第127頁的註①到註③都是。不但对于篇幅較小的書籍不註明卷頁数目，甚至象广

① 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第三十頁。

② 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七十二卷，第十二頁。

③ 見《史料旬刊》第9期，第314頁。

④ 見《大清会典事例》卷188，第14頁。

⑤ 見萊特：《中国關稅沿革史》，三联書店1958年版，第2頁。

州府志（見第37頁註②），清稗類鈔（見第11頁註③）和清史稿（見第468頁的註③）之類卷帙浩繁的書籍，也只註出光禿禿的一個書名，試想一部包括536卷的清史稿，不註明卷頁數目，叫讀者從何查考呢？這樣的註腳，除了表明作者對史料運用的輕率態度而外，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當然，上述若干缺點，就本書的優點比較來說，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某些數字的註腳的差錯，看來更是無關宏旨的。但是，如果提高到樹立馬克思主義學風來說，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知道，偉大的馬克思“引證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權威人士的實證的。他从不滿足於間接得到的材料，總要找原著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令是為了証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①革命導師的這種嚴肅認真的作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由於這本書是目前流行很廣的一本好書，從而它所播下的影響也很廣泛。作為千萬讀者中的一員，我誠懇地希望在本書再版時，對上述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加以考慮和指正。

① 拉法格：《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頁。